

試論中國當代政治文論的概念、機制與歸宿

時勝勛

[提 要] 政治文論是中國當代的實踐型文論,具有很強的政治性。政治文論與政治、意識形態關係密切。中國當代政治文論就是與現實政治實踐關係密切並彰顯主流意識形態價值的文論。中國當代政治文論是中國當代文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又並非替代其他文論。從主體身份而言,政黨領袖、文宣管理幹部、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學者型文論家是形成中國當代政治文論最主要的四重身份。從生產機制而言,中國當代政治文論立足於馬克思主義文論遺產,應對急劇變化的社會現實,並不斷吸收其他有益資源。從其時代挑戰而言,政治文論在今天的認同度究竟怎樣,它是否能凝聚文論共識,建立起與學術文論的更為良性的關係,是其不得不面對的合法性危機。從文化歸宿而言,中國政治文論有其精神傳統,與其他文論形態一樣,促進著中國文藝發展,歸屬於並最終沉澱為中華文論的文化精神傳統。對這一傳統的發揮,成為中國文化的一種選擇。

[關鍵詞] 政治文論 馬克思主義 意識形態 中國共產黨 文化精神傳統

[中圖分類號] I0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19)01-0143-13

在學術界,人們所熟知的文論多是學科文論,存在於高校與科研機構之中,注重學術性、專業性,主要劃分為文學基本理論、西方文論、中國古代文論、文藝美學、馬克思主義文論等幾個方向的教學與研究。但是,還有一些文論是存在於學科文論之外的,比如政治家的文藝思想與藝術家的文藝思想(創作談)等,屬於實踐型的文論。^①文論的存在形態是多樣的,既有學科文論,也有實踐型文論,還有思想性文論,^②以及文化性的文論。對於政治文論,因其政治性,很多情況下首先不是用來研究的,而是用來學習、領會的。但是,儘管在中國當代語境中,對政治文論的學習、領會很重要,還是有必要從學術角度特別是知識社會學角度對其做一番研究。

一、何謂政治文論

文論是圍繞文藝現象所形成的理論成果,而文藝從總體上說是通過感性形式凝結而成的形象與價值觀體系。包括文藝在內的所有的形象與價值觀體系如文學藝術、宗教、倫理道德等,用一個詞來說,就是意識形態(ideology)。居於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又是與現實政治密切相關的。此時的意識形態則是一種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的意識形態。如果政治是硬政治,那麼意識形態就

是軟政治,或者文化政治。不過,儘管文藝與意識形態關係密切,但並不意味著文藝就是政治上的意識形態或者佔主流地位的組織化的意識形態,文藝及其思想還有很多非主流意識形態或者泛意識形態的內容,像道家的文藝思想就不是主流意識形態。再如,從具體文本分析,有些作品又不宜用意識形態來分析。我們只是在總體的、理論的意義上稱文藝是意識形態。

意識形態如果是一個豐富的寶藏的話,那麼經由政治(主要是政黨)的介入,而成為一種等級分明、內外有別的政治意識形態或官方意識形態,從而完成了政治與意識形態的一體化進程。比如,先秦時期儒家是一種有著濃厚意識形態性的思想體系,漢代以後統治階級將儒家提升為政治意識形態,同時又是官方意識形態。圍繞意識形態的鬥爭主要發生在國內與國外、官方與非官方、主流與非主流、組織化與非組織化等層次上。文藝是意識形態鬥爭的重要領域。在意識形態總體框架中,文藝與文論有突出的地位,成為政黨、政治力量極為重視的內容。與政治、政治意識形態及官方意識形態關係密切的文論,我們可以稱之為政治文論、政治意識形態及官方意識形態的文論。相比而言,在三個概念中,政治文論的統攝力更大一些。概言之,文論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有的文論受到政治力量的影響上升為主流意識形態,產生著重要的現實作用,這就是政治文論。

政治,從字面來說就是領導、治理的意思,主要處理的是統治、管理、階級、權力及其分配的工作。今天,政治一般多用來指政府、政黨等治理國家的行為,即政治實踐,包括政治理念、施政方針、具體政策及施政行為等。政治文論主要就是執政黨在治理國家、推進社會建設與發展中特別是在文藝領域中所形成的文論。那麼,中國當代政治文論就是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在進行社會主義文藝建設過程中所形成的文藝思想,其最主要的知識生產者是執政黨的政黨領袖,其思想體系是馬克思主義,有著較強的意識形態性。就馬克思主義原初形態的思想性而言,政治文論的底色也是思想文論,區別在於,政治文論更加自覺地服務於特定時代的政治任務,或者針對特定時代的政治任務而形成與此相應的文藝理論思想。或者說,“一代有一代之文論”,正是政治文論的最佳概括。

除此之外,還有一種寬泛的政治文論,就是文論所表達的某種政治訴求、意識形態訴求。這種政治訴求有時與執政黨執政有關係,有時則沒有具體的關係。比如文論對女性自主性價值的揭示與追求,以期獲得整個社會的重視,這種訴求就是政治訴求。還有一些對底層生活如農民工、失業者、留守兒童等群體生活狀態的揭示,以期獲得社會的重視,這也是一種政治訴求。這些政治訴求與執政黨執政並不矛盾,是一種寬泛的政治訴求。當然,也不排除一些與此距離較大或者相反的政治訴求。有鑒於上述文論的特殊性,本文暫不討論。

二、中國當代文論中的政治文論與非政治文論

中國當代政治文論是對存在於中國當代社會的各種政治文論、政治性文論的概括,它構成中國當代文論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政治文論並不是中國當代文論的全部,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非政治性的文論,二者有怎樣的區分呢?這裡有兩個區分。一是政治區分,主要看文論的現實政治屬性,與現實政治關係的遠近程度。二是意識形態價值觀區分,主要看文論所體現的意識形態的組織化的(organizational)鬆散程度。^③

政治文論是與現實政治密切相關的、組織化意識形態的文論。政治區分是就其現實政治性而言。那些立足、圍繞、服務於現實政治實踐的文論,就是政治文論,相反則為非政治文論,比如審美文論、心理學文論、語言學文論等。意識形態區分就是關注意識形態的組織化程度。意識形態文論未必都是政治文論。在這裡,我們將組織化程度高的意識形態文論稱之為政治文論或者政治化意

識形態的文論，組織化程度低的意識形態文論稱之為非政治文論或者非政治化意識形態的文論。比如馬克思主義文論就屬於前者，女權主義文論就是屬於後者。它們都是意識形態文論，都表現了對某種意識形態價值的闡揚，只是在組織化程度上，馬克思主義文論更高。因此，意識形態文論與政治文論並不同，政治文論必須是政治化意識形態的文論，是意識形態組織化程度高的文論。馬克思主義文論既是意識形態文論，也是政治文論，但在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論主要是政治文論。

中國當代政治文論就是與現實政治實踐關係密切的、組織化意識形態的文論，注重人民性、階級性、意識形態性在社會發展中的決定性意義，主要有馬克思主義文論、社會主義文論、中國共產黨政黨領袖的文論及其衍生的黨的文藝政策等。其中，政黨領袖的文論最容易辨識，就是由政黨領袖所形成的文論。而馬克思主義文論、社會主義文論主要是就其體現的哲學基礎、社會實踐而言的。有的時候，我們將其稱為左翼文論、左派文論。^④從歷時性而言，歷史上曾經存在過的政治文論就是政治文論史，儘管它們可能與今天的現實政治距離較遠，但其性質卻是一致的。

非政治文論與現實政治實踐關係較遠，體現著一般性的、寬泛的、非組織化的意識形態。它們並不構成現實政治的反對力量。非政治文論的重點不在於政治性，也不在於組織化的意識形態，它更多地立足於學術本身。就內容而言，非政治文論主要研究並強調西方文藝思想和中國古代文藝思想的各類文論。非政治文論在內容上更多地研究西方文論和中國古代文論，並主要闡發其價值（歷史性價值與普遍性價值）的文論，更多地彰顯西方文論和古代文論的價值，或者認為它們為文論的主要價值。這種文論主要在學術層面上，並不觸及現實政治。

如前所述，政治化、組織化意識形態的文論其政治性是極強的，其主要使命是彰顯主流意識形態的價值、掌控意識形態上的領導權、服務於現實政治的需要。政治文論或者政治化意識形態的文論強調政治性、政策性，甚至圍繞政府、政黨的政治實踐進行文論以及文藝生產，是典型的政治文論。此外，有些學者在研究西方文論和中國古代文論時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這也是政治文論的一個分支，只不過不太典型。因此，在本文中所使用的政治文論主要指組織化的意識形態的文論和一般意義上的政治文論。

三、中國當代政治文論的主體身份

中國當代政治文論就是服務於現實政治、意識形態需要而形成的文論。那麼，如何形成這一文論呢？任何文論的形成都有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這就是文論的主體身份。中國當代政治文論的主體身份是複雜的，大體有以下四個層級。

（一）政黨領袖

中國當代政治文論的第一個主體也是最重要的主體身份是政黨領袖或最高領導人，具體職務在今天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⑤在共產黨發展的早期歷程中，政黨領袖並不穩定，變換頻率較大，只有到了1935年，中國共產黨的政黨領袖才穩固下來，至今已經歷了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五代最高領袖。共產黨的政黨領袖十分注意包括文化、新聞、文藝在內的意識形態工作的重要性，比如列寧有《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這對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思想影響深遠。^⑥中國共產黨歷代最高領袖都有一系列的關於文藝的論述，而最為重要的文藝思想是毛澤東文藝思想，構成中國當代政治文論的主幹。^⑦

政黨領袖的文藝思想的體現主要是有關會議上的講話，主要媒介是政黨和官方媒體（新華網、人民網、《人民日報》等），一般不發表論文、出版著作。在有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會召開專門的高級

別的文藝座談會,政黨領袖發表重要講話,比如1942年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⑧2014年習近平的《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⑨等,是形成文藝思想的重要契機。還有在中國文聯、作協歷屆大會(五年一屆)召開之際,依慣例政黨領袖出席並發表講話,比如2016年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就做了講話,闡發其文藝思想。^⑩

中國當代政治文論主要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政黨領袖構建的,屬於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重要組成部分,具有“綱領性”地位,對中國當代文學實踐起到了重要的推動、規範、引導作用。此外,中國共產黨會在政黨領袖文論的基礎上以黨的名義發佈一些有關文藝的決定、決議、意見,^⑪是政黨領袖文藝思想的制度化落實,更具有制度性、政策性。這種制度性、政策性的政治文論我們將其稱之為黨的文藝政策。^⑫對於這種政策性文論,學界研究比較多。^⑬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分為革命時期、建設時期、改革時期三個階段,革命時期是革命化的文藝政策,注重動員性,主題單一,建設時期和改革時期則具有更強的靈活性。在革命時期,處理文藝與政治的關係是文藝政策的重點內容,文藝服務於政治是主要方針。在建設與改革時期,促進文藝本身的大繁榮成為重點內容。對政黨文藝政策的研究對於理解某一國家和地區的文藝現實有一定的作用。^⑭簡言之,中國當代政治文論主要就是以中國共產黨歷代政黨領袖的文藝思想為主幹並落實為黨的文藝政策的文論。

(二)文宣管理幹部

政治文論有一個特殊的地方在於非常注重時代性、實踐性,不是停留在文本上,而必須迅速產生重大的政治社會影響,這就需要黨的各級組織對政黨領袖的文藝思想加以推進。由於政治家身份的特徵,其文論只是指導性、引導性,很多問題不能系統展開,需要進一步的闡釋。這就需要文宣系統了。這就是第二個主體身份,即文宣系統管理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簡稱文宣高幹),比如中國共產黨中央與各省級宣傳部部長、副部長,中國中央政府及各省級政府文化部門負責人等。他們對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政策的詮釋落實有著重要的作用,他們的主要負責人也有一系列的文藝思想。

文宣高幹的文藝思想大體有兩個模式,第一個模式是自主性模式,比如歷史上的瞿秋白(曾短時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袖,此前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前鋒》主編)、茅盾(中國文聯副主席)、周揚(曾任中宣部副部長、中國文聯主席)、林默涵(曾任中宣部副部長)、馮雪峰(曾任《文藝報》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等)、夏衍(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何其芳(曾任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等,都有自己較為系統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並非只是對政黨領袖的文藝思想的詮釋。還有一個原因,當時中國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革命,其性質還是革命黨,政黨領袖並沒有過多地關注文藝。在自主性模式中,理論家一般是有了自己的文藝思想之後才進入文宣系統,比如瞿秋白,在成為黨的領導人之前就有較為豐富的文藝思想。他們在擔任主要負責人期間也能不斷形成自己的文藝觀點,比如周揚。^⑮第二個模式是闡釋性模式,即理論家成為政黨領袖(最高領導人)的文藝思想以及黨的文藝政策的主要闡釋者、推廣者,不再旁及其他,如陸定一(中宣部部長)。在自主性模式中,周揚、馮雪峰長年浸淫於文宣系統,積累了大量的文藝文化宣傳經驗,形成了獨具個性的文藝理論思想,成為政治家的文藝思想的重要補充。在闡釋性模式中,今天的文宣高管更多的是一種行政工作,與文宣的具體實踐並無太多的密切的聯繫,故而無法形成專門系統的文藝理論思想,比如出版專門著作、發表論文等,更多的是一種講話。一些研究性質的機構情況要好一些,除了闡釋政治家的文藝理論外,還有一些自主性的研究成果。以創作為主的文宣系統的負責人,有時候欠缺必要的文藝理論素養,也沒有成系統的文藝思想,這是自主性模式中所沒有。在中國共產黨發展早期,以自主性

模式為主,1942年特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以闡釋性為主。

在中國共產黨內部,自上而下對黨的文藝政策與領袖講話精神的宣傳等行為多被冠以“傳達、學習、貫徹、落實”,同時還有“深入”、“認真”等強化語,這是一種政治任務,而非純粹的學術研究。^⑥但是,富有成效的政治行為又需要學術的介入,否則只能是重複或者陳陳相因,講不出新意。因此,文宣系統是需要理論家的,這不僅是必須的,也是可能的。文宣系統的文藝理論家一方面有較高的理論素養,特別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素養,能夠比較好地詮釋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思想,另一方面又注重文宣系統的規律,熟悉文宣情況,不僅僅是熟悉政策,還要熟悉具體而微的文學創作及文宣實際,落實到具體的文藝創作上。由於今天的文宣系統負責人主要是一種政治安排,並非學術性安排,思想政治要求更高,於是,“學有專攻”讓位於作為替代方案的“熟悉業務”,也就不奇怪了。當然,並不排除“學而優則仕”的情況。文宣系統的文論形態主要表現為一般性講話、社論、編者按等。

由於今天的政治文論比較偏重時效性,往往是政治文論一出來在短期內形成強大的輿論效應,這是其長處,其短處是時效性太強。這帶來三方面的問題,一是為了突出其重要性,有可能過分乃至無限抬高其理論意義,二是突出其時效性,可能影響了學術分析,影響其沉澱為深厚性的理論成果,三是言必稱馬列、政黨領袖,思想資源單一,甚至有形成教條主義的傾向。那麼,除了政黨領袖、文宣高管之外,還需要第三個主體身份——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

(三) 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

第一、二個主體身份都是黨政官員文論,只是級別不一。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在身份上不是官員,但意識形態價值譜系上與前者是接近的,並且多數擁有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一般稱之為黨內學者。^⑦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並不在宣傳文化文藝部門擔任相關領導職務,主要在高校、科研機構或文化機構等從事較為專門學術研究或理論研究,與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及政治家的文藝思想有著密切的聯繫,能夠為其提供思想資源,或者加以詮釋、解說,是中國共產黨在思想文化領域中的智庫型學者。二者的區別在於,就研究內容而言,我們稱之為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就其現實的政治作用而言,是智庫型學者。^⑧在高校以及科研機構任職,同時主要從事於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以及與文論相關的中共黨史研究,都可以稱之為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如蔡儀(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黃藥眠(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楊晦(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蔣孔陽(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王元化(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等。當然,有些理論家既在高校、科研機構任職,也在文化宣傳部門任職,比如王元化(20世紀80年代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等。他們只是短暫擔任官職,其身份主體仍然是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

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有三個特徵。其一,他們的身份主要是學者,並非是政治家或者官員,或者是“學而優則仕”,是以學者身份從政。其二,他們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有著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專門從事馬克思主義文論、美學、哲學的教學與研究,熟悉文學藝術的基本規律,其主要研究內容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史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中國化。其三,有些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還有很深厚的文藝創作實踐經驗,是作家兼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比如楊晦、王元化等。其中第一、二個特徵,即學術性與馬克思主義是關鍵特徵。

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熟悉馬克思主義理論(文論、美學、哲學)發展史,同時又緊跟時代,是政治家的文論最重要的學術闡釋者。他們對政治家文論的理論基礎、思想貢獻、現實意義等進行闡釋。^⑨這種闡釋既有政治闡釋,也有學術闡釋,但主要是政治闡釋,掀起輿論效應,服務於政治運

作。但是，學者型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家的任務又不局限於詮釋政治家的文論，還包括對馬克思主義文論史、基本原理的研究，對政治文論的形成有積極的建言諮詢作用。

相對來說，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有較為完善的組織基礎，其學科基礎是馬克思主義文論史研究，^⑩其社團組織主要有全國馬列文藝論著研究會（1978年成立，掛靠華中師範大學）、全國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會（1980年成立，掛靠吉林大學）、中華美學學會馬克思主義美學專業委員會（2016年成立，掛靠浙江大學），其刊物陣地有《馬列文論研究》（集刊）、《毛澤東文藝思想研究》（集刊）、《文藝理論與批評》、《馬克思主義美學》（集刊）、《馬克思主義文藝研究》（集刊）等。

（四）學者型文論家

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的主要領域是馬克思主義文論，但學者型文論家有的不專門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論，而是集中於西方文論、中國古代文論，有的學者型文論家雖不專門研究馬克思主義，但從不同角度切入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這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文論的有效補充。這就是第四個主體身份，即學者型文論家。他們是在馬克思主義或與馬克思主義並不對立的思想指導下進行的文藝及其研究，並不具有很強的政治性或智庫色彩。

學者型文論家雖然不研究馬克思主義，但有比較自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在研究西方文論、古代文論能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但並非是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其他堅持馬克思主義立場、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論研究其他文論領域的學者，一般不直接稱之為馬克思主義文論家，比如中國古代文論研究，稱之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古代文論學者，就會將馬克思主義泛化。此外，一些學者型文論家有其他理論方法的素養，比如符號學、生態學、心理學、語言學、社會學等。這些領域的學者並不反對馬克思主義文論，甚至比較注重二者的結合，也給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帶來了新的氣象。

學者型文論家雖然並不以馬克思主義文論為核心內容，但其理論成就卻並非與馬克思主義絕緣。除了上述多學科研究外，最重要的一個領域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或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作為西方文論的重要一支，一些治西方文論的學者型文論家也研究，這對於理解西方馬克思主義基本特徵是有幫助的。^⑪當然，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也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史，但20世紀80年代之前是不太關注西方馬克思主義。90年代以後，對國外馬克思主義、西方馬克思主義（“新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研究日益豐富。^⑫

在今天，馬克思主義文論研究的開放性日益加強，建立了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密切聯繫，不僅與國內的黨外學者型文論家也有較好的互動，與國外的馬克思主義文論家也有較好的互動（比如伊格爾頓、傑姆遜等）。^⑬黨外學者型文論家要研究馬克思主義文論，就需要自覺研讀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基本文獻，否則研究也就無從談起了。那種對馬克思主義以不同程度認可的國外文藝理論家更是如此了，比如福柯、德里達、鮑德里亞等。

學者型文論家與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的關係還表現為前者向後者的轉變。一般來說，學者型文論家與嚴格意義上的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的區別在於，在研究內容，後者主要集中於馬克思主義文論、美學，而前者則不限於此。在研究方法的系統上，後者更加系統嚴密，而前者並不重系統性嚴密性。在研究態度上，後者更自覺，前者則屬於自發。從馬克思主義的內容、系統性、態度上，前者有轉變為後者的傾向。比如朱光潛，前期是一位學者型文論家，而後期則是一位馬克思主義文論家。當然，朱光潛的馬克思主義轉向有複雜的原因，儘管有政治上的因素，也不排除學術上的因素的介入。此外，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也有可能吸收其他思想資源而呈現向學者型文論

家轉變的傾向,比如李澤厚,既有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資源,也有康德、儒家的思想資源,這使得人們在界定其思想性質是否為嚴格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的時候存在爭議。我的看法是,注重吸收其他思想資源並融入馬克思主義思想之中,宜採取更為寬容的態度,促進馬克思主義的不斷發展。

就中國當代政治文論的主體身份而言,政治家的文論是最具現實性、時代性、實踐性的文論,這是中國共產黨的性質與執政地位所決定的,這種文論主要是政治性、政策性文論,其角色是權威型政治文論。與此相關的是文宣高幹的文論,是對政治家的文論的組織、推進、落實,這種文論主要是政治、政策闡釋性文論,政治性大於學術性,其角色是組織型政治文論。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是對政治家的文論的學術性的闡釋,有深厚的馬克思主義素養和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史事業,並自覺將政治家的文論放置在馬克思主義文論史譜系中加以考量,從而確定其理論創新、前沿性及重要理論地位,也為政治家的文論的進一步提出提供重要的參考,兼顧了政治性與學術性,其角色是學術型政治文論。其他學者型文論家雖然並不太關注政策性、現實性、政治性,但比較在意馬克思主義文論發展史或者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構成政治文論的重要補充,角色是互補型政治文論。其中,政治家特別是政黨領袖的文論是中國當代政治文論中最為重要的一部分,甚至是核心部分。政黨領袖的文論具有很強的權威性、實踐性,這是中國當代行政體制的優勢。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與建設、改革事業過程中,文藝是重要組成部分,文論是促進中國共產黨的文藝事業進步的重要保障。

四、中國當代政治文論的再生產機制

中國共產黨既然是治理全國的執政黨,面對文藝事業也必須有一整套切實可行的文藝思想體系來為其服務,歷史上比較重要的有文藝“為人民大眾首先為工農兵服務”、“古為今用、洋為中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毛澤東)、^②“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鄧小平)。^③政治文論一方面通過政治文論史確定各政黨領袖文藝思想的歷史地位,同時通過不斷創造性闡釋以獲得其持續的現實意義,比如對毛澤東文藝思想的定位與闡釋。^④就在任的政黨領袖而言,他一方面要繼承以往政黨領袖的文藝思想,保持其意識形態的連續性,還要針對當下社會現實提出文藝思想,甚至要根據時代發展的規律與趨勢開創性地提出未來社會發展的文藝思想,以利於社會發展,比如“弘揚主旋律、提倡多樣化”(江澤民)、“三貼近”(胡錦濤)、“中國精神”(習近平)。^⑤這說明政治文論是需要理論再生產的,即持續地、創新地、大規模地生產。那麼,中國當代政治文論的理論再生產機制怎樣呢?大體而言,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吸收歷史上形成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遺產。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是由馬克思恩格斯所締造,為後來眾多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如列寧、普列漢諾夫、高爾基、毛澤東等所豐富的文藝理論思想體系,有獨特的方法論,比如唯物史觀、階級分析、典型理論、人民性等,能夠揭示文藝的一般規律。作為政治性的文論,它能夠服務於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社會主義建設改革事業以及共產主義人類解放事業。這一遺產受制於特定的歷史經驗與文藝經驗,因此,面對新的歷史、新的文藝的時候,並不能照搬。

二是積極應對當下急劇變化的社會現實,對當前文化文藝現實有較好的理解和把握。文論始終是把握現實而生產的,中國共產黨的政黨領袖根據時代發展的趨勢進行創造性的文藝思想生產,比如毛澤東的文藝思想就是在革命事業當中形成的。這些也被稱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對於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中國化,政黨領袖有著更大的責任和使命,他們要總攬全局,面對紛繁變化的文藝思想前瞻性地提出一系列的重要論斷,從而引領中國文藝發展,因而也必然比一般

的文論家更加高屋建瓴，這是其政治優勢。

三是對相關理論資源的吸收借鑒，比如古典文論、西方文論等。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袖本身就是理論家，不斷學習其他一切有益的和思想。政治文論的不斷發展離不開對其他有益思想文化資源的吸收，比如毛澤東文藝思想就有一些中國古典的文藝思想因素。^②

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遺產、社會現實、其他優秀理論資源，這三個方面是缺一不可的。缺乏了對歷史形成的馬克思主義優秀文藝思想遺產的繼承，中國當代政治文論就是膚泛的、淺薄的，缺乏了對當下的社會現實特別是文藝現實的深刻把握，中國當代政治文論就是抽象的、蒼白的，缺乏了對有益的優秀的思想理論資源的吸收，中國當代政治文論就是單一、單薄的。

政治文論注重實踐性，這一方面這需要政黨領袖形成文藝思想，另一方面需要文宣高管以及部分馬克思主義理論家闡釋與推進。前者是理論生產，後者是理論詮釋、實踐。從性質和角色而言，政黨領袖的文論不是作為專業、學術文論而存在的，其目的是為中國共產黨在文化意識形態領域持續執政和掌握話語領導權確立指導原則。政黨領袖的文藝思想是服務於特定時代政治任務的執政黨的政策性文論思想，一方面它有很強的時代性、實踐性，另一方面它是宏觀的，又需要具體的展開。這是政治的題中應有之義。這就引發了另一個問題，政治家的文藝思想與一般學者的文藝思想有何關係？大體上，表現在三個方面：

其一，充實政黨領袖提出來的重大理論命題，對其加以詮釋、豐富，煥發時代新意義，這種延伸性闡釋是政治闡釋也是學術闡釋。一般來說，偏重政治闡釋的是文宣系統高級管理幹部，偏重學術闡釋的是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純粹學術闡釋的是學者型文論家。政治文論會通過官方而被制度化，比如體現為國家級社科項目等，發揮智庫作用。

其二，一般學者可以研究與政策性文論較遠的文論，比如西方文論史、古代文論史、馬克思主義文論史等文藝思想遺產，這些並不具有很強的時代性、實踐性，但就學術而言又是不可或缺的。不能因為政治文論就忽略其他文論，需要給其他文論預留足夠多的自由空間。

其三，一般學者可以前瞻性地提出更多有創見的文藝理論思想，為政治家的文論的提出進行理論準備，有可能被吸收到黨的理論之中，發揮智庫作用。比如在 1942 年毛澤東發表《講話》之前，即徵求在魯藝任教的多位理論家的意見、建議，瞭解、熟悉延安當時的文藝狀況，以便有針對地提出方案。再如今天的中國生態美學的提出與研究，就早於中國共產黨的政治家的系統論述，後來生態文明整體被吸收進了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理政框架之中，生態美學也自然有了更大的拓展空間。一般學者既可以為政黨領袖文藝思想提供參考，同時也完全可以提出一些遠超於政治家的文藝思想，而政治家對此可以加以吸收從而上升到執政的高度，在全社會上加以推行。比如“中國夢”、^③“中華美學精神”、^④“中華藝術精神”^⑤等，都是在學術界有所討論，後來逐步吸收入政治話語及實踐之中。中國共產黨在制定政策或領導人在發表講話之前，都會不同程度地徵求黨內與黨外人士的意見，這也是學術文論上升為政治文論的重要途徑。只不過，這種徵求並不如學術會議那樣公開而已。

今天的中國當代政治文論如果要成為有理論內涵的政治文論，這不僅需要政治家能夠提供更系統的文藝理論思想以及文宣系統的推進以形成更大的社會效益，同時也需要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創造性地闡釋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遺產並提出與時代相適應的政治文論。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與政黨領袖在面對社會主義文藝實踐的時候，二者的作用是一樣的，都是思考社會主義文藝發展的規律、方向、成績與問題，二者並無高下之分，只是分工不同，政治家的文論具有更大的統

攝力和社會影響力,但這並非意味著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就沒有其價值。至於學者型文論家,同樣不會與政治文論絕緣,可以從不同角度豐富中國當代政治文論。

五、中國當代政治文論如何面對時代挑戰

今天的學術界非常熱衷於討論中國當代文論的身份、地位、價值、影響力,並樂此不疲。但是,如果將中國當代文論替換為中國當代政治文論,估計可能會遭遇到相反的情況:或者一言堂,或者不熱衷於此,或者言不由衷。這正說明今天的中國當代政治文論遭遇了最為強勁的挑戰。在中國當代政治文論面臨的諸多時代挑戰中,最突出的就是合法性危機,即政治文論在今天的認同度究竟怎樣,它是否還有可能凝聚全部當代文論的思想共識,它如何與學術文論建立起更為良性的關係?它與中國當代政治及其未來趨勢有怎樣的聯繫?

無可否認,今天的政治文論趨於強化,這必然導致政治文論對學術文論的全面介入,但這種強化並非學術進步之核心保證。近期的強制闡釋論以及對西方文論的某種質疑,雖有學術性的內容,但不排除意識形態背景。中國當代政治文論自始至終都有這樣一種衝動,即將政治性與學術性打通,保持政治文論的政治性與學術性的雙重優勢。然而,這種優勢在政治上無可厚非,但在學術上,卻並非政治所能完全解決。政治文論所要服務的主要就是政治,而非學術,這是政治文論的核心。如今,政治文論的強化從另一個方面說明了學術文論的自治性在不斷降低,即學術文論不得不承載更多政治力量的滲入。

一般來說,政治文論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在政治上,就是掌控意識形態領導權,那必然意味著其學術性要低於一個層級,至少不會比一般的理論家的論文更具有學術性,或者其關注的對象主要是政治性的,它不會關注什麼語言、敘事、結構等更專業的問題。然而,政治文論又很重要,於是拔高其政治意義,略化其學術意義就成為常態。這就是當前政治文論遭遇的最大困境,即政治的符號化與學術的薄弱。次生文本的繁榮就如同層累的歷史般或者如剝洋蔥般,並不意味著原始文本學術性的重要。政治文論要避免這些困境,需要激發它自己的自由的思想意志,確立與時代性的非此不可的聯繫,思考和處理如何表現時代的趨勢和呼聲的問題,而不是滿足於符號化的權力建構。

政黨領袖的文論在角色和功能上是政治性的,其主要價值是把握時代的趨勢、凝聚社會共識、促進社會進步。而這三點都需要高超的學術眼光、見識。這是政治的學術性思考。一方面,政治文論本身是否汲取了當代中國文論家的集體智慧?比如學界提到的中國夢、生態美學,就是如此。政治文論能夠吸收學界成果,這說明政治文論發揮了凝心聚力的作用。另一方面,政治文論本身與政治有著複雜的關係,如何把握時代趨勢,如何促進社會進步?政治文論究竟如何與當今及未來政治發生聯繫,如何判定其重要性、緊迫性?這除了政黨領袖自身的思考外,更重要的還是要凝聚社會共識,尤其是吸收學界新成果。學術文論甚至比政治文論更前沿、更領先地觸及這個時代的政治問題。這反過來也說明,學術文論並不與社會、政治、時代絕緣。政治文論發揮的正是學術文論本應該發揮的政治效應、社會效應。今天,有著強烈政治關切的學術文論通過社會化和政治化來實現。社會化就是類似於文化研究(文化政治、文化批評)這樣的方式,介入現實。而政治化就是學術文論上升為政治文論,進而發揮社會的影響。因此,良好的學術文論與必要的政治文論是相輔相成的。那種自說自話的政治文論與學術文論,顯然都是有問題的。

從根本上說,政治文論是政治家的國家治理的一部分,政治家的國家治理所包含的文化治理、文論治理與全社會息息相關,它必須要保持某種開放性。從文論知識平等性而言,政治文論並不凌

駕於學術文論之上。政治文論發揮的重要性與一般學術性文論發揮的重要性並不衝突,這種互滲一方面保證學術的獨立與創新,即學術文論不受政治的干涉,另一方面保證政治的共同體性,即學術文論自身的政治關切能夠被表達和傾聽。無論在歷史上,還是在現實中,學術文論自身已經深深捲入政治文論了,與政治文論構成了密不可分的狀態。學術文論的政治訴求實際上本身已經成為泛政治化文論。這同時也涉及學術文論的政治關切問題。強調學術文論與政治文論的相互獨立性,並不意味著學術文論不可以具有某種政治關切,恰恰相反,一切學術何嘗不是政治性,即試圖對現狀有所揭示和改變呢?然而,今天政治文論與學術文論的裂痕日益擴大。一方面,關於政治文論的解讀,往往表現出政治上的簡單化,無法真正觸及政治文論的重大問題,必要的爭論已經難覓。另一方面,是對政治文論的學術冷淡,試圖以學術性來質疑或弱化政治性。一個拔高,一個貶低,而政治文論究竟該如何卻被忽視了。可見,就今天對政治文論的解讀而言,原有的純政治解讀已然失效,而學術解讀又不能真正觸及政治文論的自身關節。

儘管政治文論的合法性建基於政治之上,然而,對政治文論而言,重要的不是政治,而是時代,也就是說,不斷變動的社會現實(或曰政治現實)急需新的政治文論加以應對,而這正是政治文論所必須面對的合法性危機問題,也即陳舊的政治文論需要新的轉型和更新,如何妥善地切實解決時代問題。任何政治化文論都要處理自己與時代的關係,這種時代性的合法性是政治文論必須直面的問題。今天的中國當代文論可謂一片繁榮,但它始終無法真正觸及一個真實的命題,即文學的理論探討與批評已經嚴重遠離當前文學的現實,中國人的精神、心靈與生命現實,它不能真正地解放中國人的精神世界。

政治文論希望通過政治解決一切問題的初衷遭遇學術的規律。一個時代的偉大經典未必是與時代合拍的,比如《紅樓夢》。同樣,政治文論的層出不窮並非意味著文論、文藝的真正發展。其實,政治文論自身的問題既在話語的不斷增生而實際問題卻解決乏力,成為一種空洞的能指,還在於其對學術文論的滲透以掌控領導權並不能保證它的成功。此其一。其二,如果學術文論認為政治文論退卻就意味著成功,回到桃花源般的世界或者就能創作一部新的《文心雕龍》般的作品,那也太過天真。中國學術文論的自身困境遠非政治一因。學術文論自身的民族主義困境與民主自由的政治想像與影隨行地滲透到學術文論的骨髓之中,撕扯著文論共同體,加之近年來愈演愈烈的學術工具主義、實用主義,學術文論已經背離了其參與社會進程的初衷,而淪為一種鸚鵡學舌或為稻粱謀,其自身難保。在這樣一種情況下,學術文論對政治文論的鄙夷亦是蒼白無力,它不過是一種精緻的犬儒主義而已。更嚴重的是,學術文論對政治文論的解讀也同樣被拉入功利化的快車,使得政治文論與學術文論的純粹性、自主性都已不再,從而使得雙方缺乏本可具有的某種良性互動,政治文論的嚴謹性與學術文論的獨立性日益稀薄。

六、中國當代政治文論的精神傳統與文化歸宿

今天探討政治文論不是因為它太過重要,或者太過繁榮,而是因為它本身遭遇重大的問題。唯有意識到其問題,才能煥發其潛力,把握歷史的規律。實際上,政治瞬息萬變,甚至最終留下來的幾乎很少。周王朝的文治武功早已灰飛煙滅,但源於當時的儒家文藝思想卻歷久彌新。這說明,政治文論最重要的價值是把握整個民族歷史發展的趨勢和進程,切實通過時代之變革贏得民族的未來,而不在於一時一地的繁榮,或者成為所謂時代的某種標籤。

在中國歷史上,最高統治者都有一系列的文藝思想,但未必是其原創性的成果。比如先秦儒家

在漢代上升為國家思想,其文藝思想也就成為政治性的文藝思想,後來成為中國封建時代最主要的文藝思想。就其角色而言,居於主導地位的儒家文藝思想構成了中國政治文論的主要精神傳統。但這並不意味著儒家之外就沒有其他文藝思想了,比如道家、禪宗,也同樣對文藝產生積極的影響。中國過去居於統治地位的文藝思想還是比較鬆散的,還沒有一體化,是儒釋道三教合一,但各自又是相對獨立的。到了當代,文藝思想高度整合,文藝的個性、獨特性、多樣性在不同時期被不同程度地忽視了。大體而言,儒家傳統(角色功能)、馬克思主義傳統(立場)共同構成了中國當代政治文論的精神傳統。

政治文論服務於特定統治集團和政黨的當前及未來的文藝事業,但從文論、文藝本身而言,它們又是複雜的,不可過分單一化,否則這就又走上了文藝、文論“為政治服務”的老路。文藝並非不能服務於政治,問題在於不能用政治的方式服務於政治。很多文藝都是服務政治的結果,比如王希孟《千里江山圖》、故宮等。但它們都將政治價值融入高超的藝術形式之中,從而體現了藝術價值與政治價值的統一。以政治價值衡量藝術,而無視藝術價值,這對藝術是莫大的損害。中國當代的政治文論應避免將政治單一化、絕對化,在著眼於社會主義政治實踐時,既注重“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兼顧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統一,推陳出新,弘揚中國精神,講好中國故事的政治價值,又堅持百花齊放、發揚藝術民主、尊重藝術個性與規律的藝術價值。政治文論並不直接參與或者決定文藝的生產,也不作為衡量文藝的直接標準、唯一標準,但能為文藝的生產提供較好的發展條件、營造寬鬆自由的文化氛圍。這是其重要的定位。

中國政治文論與西方文論也不同。從西方文論發展史而言,文論發展有三個特徵,一是直接的現實化,表現為文論不再憑藉文藝而是直接參與社會文化實踐,比如法蘭克福學派、後殖民主義、文化研究等。二是闡釋化,表現為文論從古典立法性角色轉為闡釋性角色,對文學實踐不再具有權威,它只是總結文學經驗、闡釋文學作品而已,比如新批評、接受美學等。三是文論的自足化,專注於文論自身的完善,關乎文本,不涉其他,比如結構主義。從譜系定位而言,中國當代政治文論與文藝實踐是密切相關的、立法化的、非自足性的文論。它一如既往致力於拉近與文藝現實的關係,還要盡可能地為文藝發展提供切實可行的方案,成為新文藝發展的指引者,最終它拒絕自足性的理論預設,而是強調文論與現實的密切聯繫,高揚現實主義精神。因此,引進西方文論,需要考慮中國實際,不可生搬硬套。

中國當代政治文論以它特有的角色發揮著重要的社會作用,能營造強大的輿論氛圍,但不是唯一形態。包括政治文論在內的一切文論,其目的主要是總結文藝規律,為文藝的發展提供參考,這不僅需要政治文論在營建自由、寬鬆、平等的文藝氣氛上發揮積極作用,也需要學科文論心無旁騖地對文藝規律進行系統、科學的總結,更需要思想文論能面對文藝創造性地生發新鮮、前沿的思想。政治文論、學科文論、思想文論都以不同方式促進文藝發展。

包括政治文論在內的中國當代文論其最終目標都是闡釋中國文藝的規律與價值,促進中國文藝的發展,只是它們立足點以及採取的方式方法不一樣而已。其實,文論繁榮不繁榮並不是最核心的,如果產生了獨具個性的文藝,文論是否繁榮已經不是最重要的問題了。比如盛唐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湧現了李白、杜甫這樣獨具個性魅力的偉大詩人,但卻並沒有與之相匹配的偉大文論,文論尚沒有能力去詮釋過於偉大的詩歌。他們富有個性的偉大創作也和唐代中央政府亦沒有直接聯繫。這就告訴我們,文藝與文論、政治並不是直接的對等關係,文藝的繁榮有著更為複雜的原因,文論、政治只是一個因素而已。文藝更多的是一種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而非揠苗助長。最不齊的莫

過於天地,它超越人為,所以才瑰麗萬千,令人神往。被設計、被規範的東西,往往不是美。因此,不可過高地強調政治、文論對於文藝的干預作用,更不可將政治、文論的繁榮等同於文藝的繁榮。

文藝所需要的遠遠大於文論,除了寬鬆的時代氛圍,利於個性發展的制度安排,更重要的在於文化傳統的滋養,那來自歷史深處的數千年的文化精華。因此,究極而言,無論是政治文論,還是學科文論或者思想文論,它們都歸屬於並沉澱於自古以來所形成的文化傳統之中,這一文化傳統就是中華文化精神(文藝精神、文論精神、美學精神、哲學精神等),它是中國當代文論的文化歸宿。對這一中華文化精神傳統的發揮,自然也成為中國文化的一種選擇。

①在文論史上,作家、藝術家的文論始終是一個強大的傳統,但進入 20 世紀以後,這一傳統日益消散,在今天能夠進行體系性文論生產的藝術家日益缺少,此處集中討論政治性的實踐型文論。

②時勝勛:《回望 1917: 試論作為思想的中國文論》,南京:《南京社會科學》,2017 年第 1 期。

③組織化意識形態是指意識形態有很強的動員性、組織性、制度性、自覺性,是體制化的意識形態,其組織化程度是比較高的。這與一般的自發的、非組織化或者組織化程度低的意識形態是不一樣的。組織化意識形態也可以稱之為政治化意識形態。組織化意識形態可以是已經居於主流地位並獲得領導權的意識形態,也可是處於非主流狀態但在爭取領導權的非意識形態,如葛蘭西所討論的文化領導權問題。這兩種組織化意識形態之間的鬥爭被稱之為意識形態鬥爭。

④左翼、左派文論不如馬克思主義文論常見。在西方語境中,左翼文論更為常用。西方左翼文論是激進文論形態,而中國左翼文論則更偏向於對正統馬克思主義文論的維護與堅持,反而不是激進的。這是中西左翼、左派文論的風格差異。

⑤在歷史上,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政黨領袖與最高領導人,並非指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而是中央委員會主席。而成為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也是經過長期歷史實踐而形成的,有時未必就是黨的最高職務,比如在 1980 年代,鄧小平作為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並非擔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因此,用職務來稱呼,又有不周延之處。

⑥列寧的《黨的組織與黨的出版物》是一個關於意識形態宣傳的文本,“出版物”一詞並非對應於文學,在 20 世紀二十至八十年代一直被翻譯為《黨的組織與黨的文學》。

⑦除了最高領導人之外,中央領導集體的其他成員也有不同程度的文藝思想,比如周恩來等,作為政黨領袖文論的補充,並共同構成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思想體系。

⑧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陝西延安:《解放日報》,1943 年 10 月 19 日。同時由解放出版社出版了單行本。

⑨習近平:《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

⑩習近平:《在中國文聯十大、中國作協九大開幕式上的講話》,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11/30/c_1120025319.htm。

⑪《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http://www.gov.cn/jrzq/2011-10/25/content_1978202.htm,《中共中央關於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 <http://cpc.people.com.cn/n/2015/1020/c64387-27718396.html>。

⑫李勇:《飄揚的旗幟——中國共產黨的文藝方針政策論綱》,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年。

⑬徐瑜:《中共文藝政策析論》,台北: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 年。王弋丁:《黨的文藝政策論》,廣西民族出版社,1998 年。周曉風主編:《鄧小平理論與新時期文藝政策》,重慶:重慶出版社,2002 年。周曉風:《新中國文藝政策的文化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

⑭比如要瞭解台灣文學,就有必要瞭解台灣執政黨的相關文藝政策,參見古遠清:《新世紀台灣兩大政黨文藝政策剖析》,天津:《天津師範大學學報(社科版)》,2014 年第 1 期。

⑮周揚是中國共產黨早期文論家,在 30 年代發表《關

於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等文。

⑯比如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在《解放日報》發表後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總學習委員會就發出通知，要求“各地黨組織收到這一文章後，儘量印成小冊子發送到廣大的學生群眾和文化界知識界的黨內外人士中去”。參見梁向陽：《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前前後後》，北京：《中國文化報》，2012年5月17日。

⑰在中國當前語境，黨內學者即擁有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的學者，黨外學者指非中國共產黨黨員身份的學者。一般情況下，當說“黨內學者”的時候總是從中國共產黨角度而言的。約定成俗起見，本文沿用黨內、黨外稱謂。

⑱一般情況下，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更中性，而智庫型學者只是從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角度而言。實際上，相比其他學者，學者型馬克思主義文論家在思想學術領域發揮智庫作用更大。

⑲參見張炯：《堅持·發展·創新——學習鄧小平同志關於文藝的論述》，北京：《人民日報》，1997年3月13日；孟繁華：《毛澤東文藝思想及內部結構》，北京：《文藝爭鳴》，1998年第4期；黃曼君：《論毛澤東文藝思想的現代性特徵》，西安：《西北大學學報》，2001年第1期；董學文：《毛澤東文藝思想的歷史地位和當代價值——獻給中國共產黨成立九十周年》，北京：《文藝理論與批評》，2011年第4期；丁國旗：《習近平文藝思想的兩個理論支點》，北京：《人民論壇》，2016年第33期；范玉剛：《“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習近平文藝思想的人民性研究》，北京：《文學評論》，2017年第4期；董學文：《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創新性發展——習近平文藝思想的當代價值研究》，北京：《中國文藝評論》，2017年第4期。

⑳文藝學有很多方向，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並沒有成為一個方向，而是在各個方向都存在，主要是文學基本理論。文學基本理論是馬克思主義文論的主要領域。

㉑西方馬克思主義一般不被視為正統的馬克思主義。正統的馬克思主義主要指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在各國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社會革命。在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更多的是一種左翼知識份子的聯合體，比如齊澤克、傑姆遜等。最近學術界則更多地將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與國外的馬克思主義並稱，將國外的馬克思主

義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如“全國國外馬克思主義論壇”等，不再著意分別其正統性與非正統性。

㉒連錫等：《國外馬克思主義文論家文論選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馬馳：《“新馬克思主義”文論》，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年；王天保：《西方馬克思主義文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馬馳：《西方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當代文論》，河南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

㉓比如2011年舉辦的“中英馬克思主義美學雙邊論壇”（後更名為“國際馬克思主義美學論壇”），至今已舉辦6屆，建立了中外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交流的學術機制。

㉔1957年，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講話明確指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是促進藝術發展和科學進步的方針，是促進我國的社會主義文化繁榮的方針。”

㉕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文藝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社論，主要闡釋鄧小平“二為”方向。

㉖龍新民：《毛澤東文藝思想對當代文藝工作的指導意義》，北京：《光明日報》，2013年12月18日。

㉗習近平比較注重文藝精神，主要涉及愛國精神、時代精神、民族精神、現實主義精神、文化精神、審美精神、中國精神等。參《習近平的文藝精神論》，人民網 [http://politics. people. com. cn/n/2015/0913/c1001 - 27577632- 2.html](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913/c1001-27577632-2.html)。

㉘毛炳漢：《毛澤東文藝思想與儒家文化傳承探究》，長沙：《求索》，2003年第6期。

㉙樂黛雲：《美國夢·歐洲夢·中國夢》，上海：《社會科學》，2007年第9期。

㉚潘知常：《中國美學精神》，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93年。

㉛李希凡：《中華藝術精神及其特有的觀念體系》，太原：《晉陽學刊》，2000年第5期。

作者簡介：時勝勛，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韓國高麗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北京 100871

[責任編輯 桑海]